

马克思主义制度观的本质及其现实启示

程圆圆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0)

摘要: 从制度的表现形式来看,制度可以理解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一种规范亦或是一种意识形态。然而深究其本质,制度是交往实践和生产实践的产物,在具体历史中表现为社会关系质的规定性,终极价值目标是为了实现“共同体”上的个人自由。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觉自信,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

关键词: 制度;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图分类号: D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102(2017)04-0006-04

The Essence of Marxist Institutional View and Its Revelation

CHENG Yuan-yuan

(Academy of Marxism,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system, the system can be understood as a social form, a normative or an ideology. However, the essence of the system is the product of communication practice and production practice. It is expressed in the concrete history as the stipulation of the quality of social relations.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achieve the individual freedom and the real community. Therefore, we need to constantly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dhere to the self-confidence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vide the Chinese program of the “human fate community”.

Key Words: system; Marxism; socialism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制度是一个涵义非常丰富的概念,不同的学科、甚至同一学科的不同学派有着不同的见解,而对于制度的理解不能仅阐释其表现形式,更要从实践、关系以及价值的维度来理解其本质,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制度的自觉自信。

一、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中我们这样理解制度的内涵,首先制度是一个历史客观存在物,在人类历史中通常以社会形态的方式出现,然而这种存在物并不是“自然物”,它离不开社会与人的交往,所以是一种处理社会关系的一种规范性中介物,在阶级社会中更是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据此,制度就阐述为以下三种定义。

从广义上来说,制度是一种社会形态,反映经济过程及社会结构基本历史性质与特征,为现实的经济过程提供一个基本框架,形成人们在其中活动的制度环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通常从社会基本结构或是社会形态上来理解制度,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文中,“把各国制度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即社会形态”。^{[1][P33]} 马克思也有说制度是“一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固定化的形式”,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体,被社会历史确定下来就表现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也就是社会形态。一方面,人的实践在物质生产领域形成生产关系,以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为表征,它赋予人们之间的物质交换以一定的历史规定性,这是制度在经济基础上的集中表现;另一方面,人的实践在非物质生产领域

收稿日期: 2017-06-20

作者简介: 程圆圆(1991—),女,河南信阳人,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围绕政治活动形成的政治制度,围绕社会结构的分化和专门化形成的社会制度等,是制度在上层建筑中的集中表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统一起来,制度就表现为在历史中不断演变的社会形态。

从狭义上来说,制度是一种处理社会关系的规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必然要发生联系,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诸种联系并不是直接的,必须要通过一种作为中介物的中介,才能使得其联系成为现实,这一中介就是制度。因此,社会的各种关系需要制度来确定,表明一种社会存在方式。从社会关系来理解制度必须坚持两个维度。首先,历史性。制度根植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状况、社会关系状况、思想政治文化状况以及现实的人的状况之中,并体现着这些状况,“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 and 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2] (P245)}它在本质上反映了某个具体历史时期特殊领域内人类社会关系的性质,是人类在这种生产自身社会关系的活动中,产生的一种处理这种关系的文明形式。其次,规范性。我们可以说制度是一种社会关系,但不能反过来说关系就是制度,在众多的社会关系中只有具有规范意义的关系才构成制度,只有对社会关系进行规范性规定才能称其为制度。

制度还可以认为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制度体现社会关系,将他们凝结化、固定化,在阶级社会中,这种关系就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社会统治者确定或社会认可的关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3] (P52)}意识形态不仅反映了现实的经济关系,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并且能够支配非统治阶级,通常表现为政治、法律、宗教等上层建筑,表现出一种制度

形态。

二、马克思主义的制度本质

对制度的概念仅仅停留在定义上是不够的,还需要从人的实践、社会关系以及规范基础来把握制度的本质。

(一) 实践维度——制度是交往实践与生产实践的产物

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 (P56)}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制度观不是某种先验的价值理想,而是一种扎根于实践的“交往的产物”。

人类的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就是制度产生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做了明确的阐述:“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2] (P130-131)}由此可见,我们需要从交往与生产的维度来考察制度的起源。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亦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制度的起源要从人说起。“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作为社会存在物具有天然的社会性,“社会性”的人生活在具体现实生活中,通过物质生活活动和精神生活活动结成各种关系。最初人们为了改造自然界形成协作劳动和相互交往的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实践的深入,逐渐形成了更加繁杂的社会关系。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关系已经“不是由生物本能决定的合群倾向,而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一种必然联系”。^{[4] (P44)}人的“社会性”现实表现为各种社会关系,实践活动则是社会关系产生的前提。再者,从人的存在和发展来看,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的需求的无限性决定了人永远处于不足和匮乏之中,必须不断进行生产实践满足生活所需,但“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2] (P344)}人们为了“共同活动”的顺利进行,交往活动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此时的实践活动并不止在于结果,更在于过程本身,从生产到交往再到生产的过程就形成了制度产生的空间。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进行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就要求这种生产实践基础上的社会交往首先有其自身的客观有效性,保证人们的交往活动必须在一定的模式内进行,包括特定的交往手段、对象、环境条件等来促使交往主体目的的

实现。另一方面,这种交往活动还需要一种规范来保证其有秩序的进行,保证社会个体或群体之间,以及个体和社会之间在交往活动中相互交换其活动、产品、工具,交流、传递其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以达到理解、协调、合作、一致的相互作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活动方式和存在方式,如果被社会以历史的形式固定下来,也就是马克思所理解的制度。

(二) 交往维度——制度表现为社会关系质的规定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制度的使用非常广泛,从“把各国制度概括为社会形态这个基本概念”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再到“工厂制度”“税收制度”等,反映了制度的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表现,但仅仅停留在现象阐述是不够的,从本质上来说,制度表现为对社会关系质的规定性。

人类实践总是在多重关系之中进行的。人类一出生就面对既定的制度,生活在已有的制度环境中。人们的活动,也是通过制度与他人与社会发生关系。人们对自身实践方式的肯定以及自身本质力量的确定也需要制度的规范。制度用一整套的行为规则规定着人们之间关系,规定着人们的社会角色、地位、权利和义务。“原子状态”的人与人之间的隔离、分散,只是由于有了制度,才有了制度确定和代表的丰富关系,才有了人的社会关系的现实性。

制度通过规范社会关系使得社会关系有序且稳定,不同的制度则表现了不同质的社会关系:封建专制制度使人们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人的依附性,资本主义制度下形成的则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前资本社会,人们的生产能力和活动范围受到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约束,人与人的关系也都以家庭关系和氏族关系为主,偶尔会在不同的共同体中进行物质交换,整个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表现为“人的依赖关系”。与低水平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先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始社会制度,继之以主人—奴隶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奴隶制社会,接着是以地主—农奴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封建专制制度。在资本社会,“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5] (P107)} 整个社会就表现为物化的社会关系。

(三) 价值维度——实现共同体上的“个体自由”

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但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论旨归,也同样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终极价值目标。

在我国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研究中,都从人的生产实践出发,强调实践主体性,用主客二分的思维立场,从两极对立中去认识主体之间的交往,突出自身的主体性地位,忽略他人的主体价值。哈贝马斯就批评马克思,认为他把劳动关系理解为一种主客体关系和指向成功的行为,而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理性。然而事实却是,“交往”与“劳动”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来的马克思思想中一直是同时并存、相互交织的,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关系的生产活动,并且“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2] (P68)} 马克思用交往主体来克服抽象的个体主体,认为主体的产生总是在交往中形成的,交往在一开始就是作为生产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的前提而产生和发挥作用的,主体的任何活动从来都是社会性的,它要求众多的个体主体共同参加,并且只有在共同的交往中才能“使大家的共同行为取得一致成为可能”。因此,不同于哈贝马斯等西方理论家对社会理论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范式转换,从自我实现、自我发展到相互承认、人类团结的规范基础变迁,马克思是把“实践主体性”与“交往主体间性”有机统一起来,据此预设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兼顾个人自我发展与社会整体发展的价值取向。^[6]

共产主义并不仅是一个美好的社会形态,更是一个从现实的人出发,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必然性。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在“最后一个对抗形式”,是资本主义社会冲突发展的必然产物。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出现,是因为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出了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必然的产生出了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并且资本对“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社会关系)的无止境开发,产生了使人片面发展的社会分工体系与相应的社会文化系统,限制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资本的统治本身又促进了人的能力和需要的发展,加强了全球范围内的交往和联系,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实现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现实启示

对制度进行哲学上的理论分析,把握制度的内涵和本质,并不只是为了概念上的逻辑推演和辨析,更是为了深入实际,给制度实践以指向。在立足制度的功能维度、本质维度和价值维度的基础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丰富发展制度文明提供理性保证和理论支撑。

(一) 立足制度功能,不断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社会发展

制度是人赖以处理其社会关系以实现其自由而又全面发展的中介物,相对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这最根本的目标来说,制度具有不可忽略的基础作用。因此,制度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和基础,是发展进步的动力之源,制度问题更是直接关乎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建立并逐步健全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的根本制度保障,可以说我们党成立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社会制度规范生产关系提高人类的“合作生产效率”,对生产力产生重大的“环境”作用,所以人类的生产力是能否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关键取决于当前的社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植根中国社会,符合中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特点和优势,能够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社会生产力的生机和活力,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二) 立足制度本质,突显“实践性”与“人民性”,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和自觉

制度的产生、存在和发展都是从人的实践出发,从人的需要发展出发,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更是契合人民选择的价值应当性和历史选择的发展必然性,需要我们坚定不移、不容置疑的坚持下去。人民对制度拥有多大的自信,取决于制度本身的生命力,而制度的生命力又取决于制度满足人民需要的程度。中国共产党赋予制度以生命力的关键在于坚持人民立场,在于从人民实际生活需要中推进制度建设,把人民性和实践性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历经

90多年奋斗的伟大创造,是促进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根本保障。因此,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觉、自信,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以增强推进改革开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制度依托。

(三) 立足制度价值,人的解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世界文明新秩序

制度通过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特殊关系的表征,表达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关怀,自由人联合体的应然性与必然性,也为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提示了现实的道路。单个人的活动越来越受到世界市场力量的支配,世界交往的加强大大丰富了人的社会关系,个人由狭隘的地域性个人变为世界历史性的普遍的个人,因此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创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作出了“屋顶式”设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促进各国打造共商共享的治理新模式,更好地顺应时代潮流和国际格局变化,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使各国共担责任、共享成果,这是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的基础所在。我国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性实践中充分发挥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作用,展现出中华民族休戚与共的和谐理念和“天下”情怀,将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确立为坚实的理论底蕴,不断推进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 [1] 列宁. 列宁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 [4] 韩针. 生成的存在——关于人和社会的哲学思考[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6] 郝戈. 规范基础问题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规范性建构[J]. 天津社会科学, 2012(2).

责任编辑: 徐书生